

语言世界观多元论

——八论语言的体验观

王寅

(四川外国语学院,重庆 400031)

摘要:语言世界观主要研究语言与思维(即认知)、与现实世界和社会世界之间的关系,论述语言在世界观形成中所起的作用。当前,在这一问题上主要有四种基本观点:(1)反映现实论;(2)认知假说论;(3)语言决定论;(4)语言思维二元论。前三种观点具有明显的单向论述的倾向,且这四种观点都没能将社会文化因素考虑进来。为此我们提出了语言世界观多元论,认为现实、认知、语言和文化这四要素之间存在着一个“多元相互作用”的关系,在此框架中提出:现实决定认知,认知决定语言的决定关系;语言影响认知,认知影响现实的影响关系。笔者近年来基于体验哲学和认知语言学的理论重点论述了语言体验性,一方面为语言世界观多元论作了理论铺垫,另一方面语言世界观多元论也为语言体验性提供了证实。

关键词:语言世界观多元论;体验哲学;认知语言学;语言的体验观

中图分类号: H00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5831(2007)01-0112-06

一、引言

19世纪末-20世纪初哲学界形成的语言论转向专注于语义和语用研究,哲学家们通过语言分析来揭示语言规律,洞见语言本质,分析语义形成,寻找语用规律,以达到解决哲学问题,回答人与世界之间关系的目的。那么,研究语言与世界之间的关系也就成了中心话题,语言世界观主要就是围绕这一问题进行思考的。

体验哲学和认知语言学认为,语言是在人类对现实世界感知体验的基础上通过认知加工逐步形成的,这一程序可简述为“现实—认知—语言”,基于此我们自然就能得出“语言具有体验性”这样一个重要性质。另外,这一程序还要受到社会文化等因素的影响,基于此我们提出了语言世界观多元论。

二、语言世界观

世界观是指人们对世界的总的看法,在人们形成对现实世界看法的过程中,语言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所谓语言世界观,主要研究语言与思维(即认知)、与现实世界和社会世界之间的关系,研究语言在世界观形成中所起的作用。当前,在语言世界观问题上主要有以下四种基本观点。

(1)反映现实论:这是一种传统的观点,认为语言是客观反映现实的。我国很多学者持这种观点。

(2)认知假说论:由瑞士著名心理学家皮亚杰提出,从认知角度出发,认为认知决定语言。

(3)语言决定论(又称语言相对论、沃尔夫假说):语言能将其结构加于客观外界,世界上不同的民族会因使用不同的语言而产生对外界认识上的差异。

收稿日期:2006-12-16

作者简介:王寅(1951-),男,江苏人,四川外国语学院外国语文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理论语言学和英汉对比研究。

(4)语言思维二元论:潘文国(1997:26)认为,语言是客观现实经过人类思维作用的产物,然后又强调语言对人类认识的反作用。

三、语言世界观多元论

我们不能只看到语言仅是客观反映现实的一面,因为确实存在着同一个现实世界产生了不同语言结构的现象,一个语言的绝大部分词语在另一语言中很难找到完全对等的同义词。当然,我们也不能走到另一个极端,思维完全由语言所决定。在半个世纪前十几个国家曾形成过一个社会主义阵营,在这个阵营中,各国所使用的语言不相同,但有过类似的哲学观点和思维方式。因此,单方向思考问题不全面,忽视了问题的复杂性。同时,在论述语言世界观,分析语言与现实、认知之间关系时也必须考虑社会文化因素。

皮亚杰于1970年在《发生认识论原理》中提出了认识起因的建构论,他(1970,汉译本1981:21)指出:“认识既不是起因于一个有自我意识的主体,也不是起因于业已形成的(从主体的角度来看),会把自己烙印在主体之上的客体,认识起因于主客体之间的相互作用。我们曾于1998年基于认知语言学的基本理论和皮亚杰的建构论和互动论提出过“现实、认知、语言、文化”四因素互动的语言世界观多元论,本文主要从体验哲学以及与语言体验性的关系这一角度深化论述这一观点。

从体验哲学和认知语言学角度,只有综合考虑到这四种因素的互相依存和相互作用,以及它们的多元关系和共力作用,才能形成一个较为完整的语言世界观,或者说,也只有从这四者多元互动的角度,我们才能建构出较为完整的语言世界观理论。该观点如图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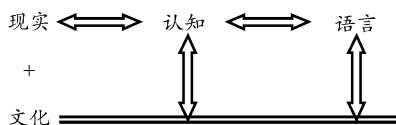


图 因素互动的语言世界观

在体验哲学和认知语言学的“现实—认知—语言”基本原则建构出的语言世界观多元论,可进一步解读为:(1)现实是认知和语言的基础,现实决定认知,认知决定语言;(2)认知是现实与语言的中介,认知反映现实,依靠语言凝化;(3)语言是现实与认知的结果,同时,语言反映和影响认知,认知反映和影响现实;(4)文化与人类生存息息相关,与现实、认知、语言密不可分。

(一)现实决定认知,认知决定语言

承认现实决定认知,这是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体验哲学和认知语言学接受了这一基本观点(王寅,2005:47),同时也强调了人的认知对语言的决定作

用,认为:语言不是直接反映客观世界,而是有人的认知介于其间的,不同民族的认知结构存在差异,所形成的范畴、意象、图式和认知模型等也有不同,这才形成了林林总总的语言表达形式。

即现实首先经过认知加工之后才与语言发生联系,经过有差异的认知“过滤”后,才对语言的词汇、结构产生了决定性的作用,致使语言产生差异。Haiman(1980:535)曾指出:“词汇量是世界观复杂度(非语言变量)的标记符。词汇量反映了对世界认识的复杂程度,复杂的认知会产生复杂的词汇系统,词汇量与世界观之间存在象似现象,例如:

(1)印第安语里一般没有脱离具体事物的抽象说法,爱斯基摩人的数词不超过“10”。孔狄亚克(1746,汉译1989:91)也曾述及这一件事:据洛克说,有一些美洲人,他们一点也没有千数的观念,实际上他们仅仅只想出了从1计数到20这些数目的名称。

(2)自然界中下的雪是相同的,但受到各语言社团的生活方式和活动需要的影响产生了差异,爱斯基摩语中有几十个表示“雪”的单词,而英语中只有一个,连同“sleet”包括在内,也不过两个。在斯堪的纳维亚北部的拉普语中,有许多表示“驯鹿”的单词。在阿拉伯语中有400多个词表示“骆驼”,因为骆驼曾是大多数阿拉伯人的重要交通工具。

(3)根据Haiman的观点,我们还可得出这样的结论:词术语象似于社会亲疏关系。在以英语为母语的社团中,只有brother, sister(不分长幼);uncle, aunt(不分长幼,不分父方/母方);cousin(不分长幼,不分父方/母方,不分男女)。关系紧密的就用单词加以描写(lexicalized),如son, daughter等;关系远的就用词组来描写,如:son-in-law, daughter-in-law, the wife of my husband's brother(妯娌), the fathers of husband and wife(亲家公),这些词语正是社会现象通过思维与文化在语言中的反映。

同一个“地瓜”、“向日葵”在汉语中有几十个名称,“妻子”在不同语言、不同时代、不同民族之间有很多不同的称呼,这些都是人们认知差异和文化不同的反映,如果在现实和语言之间没有“认知”这个中介,就不能解释同一物体为什么在同一语言社团和不同语言社团中会有不同的名称。英汉两语言在很多词语表达和句法表达上的差异,都是由英汉两民族在认知上的差异所致。

为此,从语言的体验性角度出发,就语言普遍性和差异性来源问题得出了与天赋说完全不同的观点:语言之所以存在一定的共性,是因为我们面对相同或基本相同的自然世界,我们有相同的身体构造和功能;语言之所以存在差异,是因为社会文化差异和人的认知方式差异所致。

(二)认知反映现实,依靠语言凝化

认知是人脑的一种特殊机能,一方面可以运用概念、判断和推理等形式来反映客观现实的过程,但另一方面,当人类掌握了某些客观规律之后,就会产生创造力和想像力,创造性地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产生出改造现实世界的动力,这也是辩证法的观点。

认知源于现实,基于感知,始于经验。人类是在不断认识世界,改造世界中进步的,在我们所经历的几个社会形态中,都是以人的认识发展及由此产生的生产力发展为标志的。在人类发展的长河中,认识总是在不断进步,朝着渐趋完善的方向发展,永无止境,认识的终止就意味着人类社会的结束。这一命题本身就蕴涵着在静态的某一阶段,认知总是低于现实,即使在科技高度发展的今天,大千世界对于人类仍有无数不解之迷。因此,我们的认识常有不足,看法总归有偏差,乃至较大错误,人类在某一历史时期所获得的只能是相对真理,而不可能获得绝对真理,我们只能在不断完善对世界的认知中进步。

认知对现实的反映还须借助语言将之“凝化”,或“勾勒”在思维中,并靠语言将认知的结果记录下来。我们的老祖宗历来认为“言为心声”实际上就反映了这一观点。索绪尔(高名凯译,1996:157)曾指出:“从心理方面看,思想离开了词的表达,只是一团没有定形的、模糊不清的浑然之物。哲学家和语言学家常一致认为,没有符号的帮助,我们就没法清楚地、坚实地区分两个观念。思想本身好象一团星云,其中没有必然划定的界限。预先确定的观念是没有的。在语言出现之前,一切都是模糊不清的。可见,认知必须借助语言的凝化作用,才能区分观念,有效地进行思维。今天的我们,比起我们还没有掌握语言的老祖宗来说,思维要健全和发达得多,语言在其间所起的重大作用功不可没。”

一方面认知必须借助于语言来凝化,另一方面语言也是认知的基础。罗宾斯(Robins,1967)说:“语言是进行逻辑论述和推理的工具(李振麟译,1976:437)。道理也正在于此。”

马克思(中译本,1960:525)曾指出“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斯大林(1979:527)在“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一文中曾说过:“不论人的头脑中会产生什么样的思想,以及这些思想什么时候产生,它们只有在语言材料的基础上、在语言的词和句的基础上才能产生和存在。没有语言材料,没有语言的‘自然物质’的赤裸裸的思想是不存在的。”

可见,语言与认知互相作用,彼此不能脱离而单独存在。认知借助于语言来进行,语言是认知的物质外壳和体现形式,并将其凝固下来,割裂认知与语言的联系是唯心的做法。但语言也不能等同于认知,认知是一种心理活动,它决定着语言的表达形

式,语言是这种心理活动的终极产品的表达形式。

(三)语言反映和影响认知,认知反映和影响现实

第一,在(一)中已论述了“现实决定认知,认知决定语言”的观点。反之可表述成:语言反映认知,认知基本反映现实。Haiman(1980:537)曾指出:“思维的结构又反映了现实的结构,而且这一反映比起人们通常的了解要大得多。”

认知语言学认为,语言不是一个独立的系统,句法也不可独立于语义,它们是客观现实、人的心理基础、认知方式等多种因素综合的结果。语言能力是人的一般认知能力的一部分,语言必然服从一般的认知规律。

古希腊时期的斯多葛学派哲学家就持有类似的观点:语言的外部形式是人类本质内在普遍性的反映。当今很多语言学家、哲学家、心理学家都在研究语言,以图通过语言分析来揭示人类的思维特征。基于语言的体验性特征,我们必然要提出象似性原则,语言是人们在现实世界感知体验和认知加工的基础上形成的,语言的表达形式必然要反映客观世界和人类认知的特征,但各个民族、各种语言反映的方法和途径既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这与上文基于语言体验性所论述的语言普遍性和差异性观点相同。

第二,语言不仅仅是反映认知,认知不仅仅是反映现实,而且,语言还可影响认知,认知还可影响现实。不同的语言结构,不同的语义系统,将会对人们的认知产生不同的影响。儿童在接受语言教育的同时,自然也就接受了语言中所包含的思想、文化和世界观。

在现实与认知这一对关系中,现实是第一性的;而在认知与语言这一对关系中,认知又是第一性的。我们常说:某种思想难以言传,不能用语言描写,也可用来说明这一观点,思维中有部分内容是难以用语言表达的。当然,我们最终会有方法用语言来描写那些难以言状的复杂事物和感情的,这样,认知的发展就会促使语言的发展。

以上分析可见,语言是服从认知需要的,因此我们主张在讲语言对认知和现实的反作用时,既有“反映”,也有“影响”,而且只说是“影响”,不主张走极端,说成沃尔夫的“决定论”。因为,倘若按照“语言决定论”的观点,语言决定了人们的世界观和认知,那么不同的语言就会有不同的认知,既然操不同语言的民族认知不相同,它们之间又如何能够互相理解呢?又如何解释不同语言之间的可译性呢?另外,操不同语言的民族可能有共同的文化,有不同文化的民族可能使用相同的语言。因此语言决定论的说法显然有较大缺陷。

我们不同意“语言决定论”的绝对说法,而主张语言对认知具有影响性的反作用。罗素曾指出:“与词汇的影响相比,句法对思想的影响尤其强烈,一些陈述句的句法形式或语法结构往往成为我们思想上的桎梏(涂纪亮,1996:47)”。笔者同意罗素的“影响论”观点。

认知对现实所具有的影响性反作用,还体现在人具有创造性和主观能动性上。人类认识了科学规律后,就会产生改造世界的动力,人类科技发展的历程就证明了这一点。从微观上,语言还可以通过“认知”这一中间环节来影响人们对现实世界的认识,笔者在此提供以下几个例子。

(1)在20世纪90年代成长起来的城镇里的孩子,很熟悉妇女用来化装固定发型用的“摩丝”,它可喷出白色的泡沫,而没见过真正的鹅,更不知道鹅毛是什么样子,当他见到大雪纷飞时,会不假思索地说出:老天爷在打摩丝,而没有用“鹅毛”来比喻大雪。这个例子可用来说明孩子的语言词汇影响着他的思维方式,影响着他对现实的认识。

(2)汉语语言系统中的计数方法是“四位式”的,即:个、十、百、千,然后是:万、十万、百万、千万,然后是亿。而英语计数是“三位式”的,即:1-9、ten(-ty)、hundred,再多是 thousand、ten thousand、hundred thousand,接着是 million、ten million、hundred million,然后是 billion。其计数方式与阿拉伯数字所采用的三位一撇的写法一致,如531,297,288,966从右向左,第一个撇号前为 thousand,第2个撇号前为 million,第3个撇号前为 billion。据一位在国外生活了几十年的老华侨讲:他的英语已非常流利了,而在算数时还得用汉语的“四位式”来算。对学英语学了很多年的中国人来讲,说600个千,不一定知道有多大,而讲60万时才可能更为清楚。我们在进行中外语言翻译时,遇到较大数字时,往往总要费点时间思考一下才能弄清楚。从这个例子亦可见,语言对思维的影响可谓是根深蒂固。

(3)马列主义是靠语言传入中国的,指导着中国共产党人的思维和实践,变革了现实。改革开放以前,我们所了解到的伦敦概貌大都是从书本上得到的,一直认为它是“雾都”,其实早已不是了。

(4)邓小平1992年的南巡讲话,在全国形成了一个改革开放、经济发展的高潮。寥寥数语,影响了人们的思维,推动了对现实的变革。这正应了言语行为(Speech Act)里的以言取效行为(Perlocutionary Act)的理论。

人类语言促进了人类认知的发展,而人类认知的发展也决定着人类语言的进步。从不同语言的对比研究中可发现表达形式上的差异,从而可探索操不同语言的民族在认知上所存在的差异。

四、文化与人类生存息息相关,与认知和语言密不可分

一个社团的百科性文化知识是指该社团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文化既受大自然和社会环境的约束,又是构成人类社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语言既是文化的载体和表现形式,又是文化的主要内容。萨丕尔(1929)曾说过:“语言首先是一种文化产物或社会产物,并且必须这样去理解语言。”当然,一个民族的文化又与他们所生活的环境密切相关,正如钱连冠(1988:2)所说:大自然顽固地将自己的脾气复写在民族的性格上——或奔放热情、或自守冷漠、或脾气暴躁、或性情温和、或坚挺忍耐等等。大自然确实造就了人的某些性格,而这些性格到头来都表现为文化品格。宇宙造就了人,人的文化行为模式对宇宙万象产生重复,相互感应,我们认为,这就是文化的体验性。

在本文提到的四种语言世界观模式中,“文化”因素并未包含在内。其实,百科性文化作为人类社会共享的产物,是一个社会的道德情操、风俗习惯、言谈举止、价值观念、认知方式、宗教信仰、科技文学等的总和,它能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人类的活动方式。每种文化都已形成和拥有一定的常规,构成对同一文化各成员的交际能力的制约和供其参考的规范,因此,文化在任何一个社团中对人们的认知与语言有着不可低估的重要作用,正如沈家煊(1993:7)所说“不同的文化造就了不同的概念结构,映照概念结构的语法结构也就有了差异”。这就道明了文化与语言世界观的密切关系。

传统文化在语言词汇中都有对应的反映,这已引起广大学者的密切关注。在英语表达中有很多与基督教有关的词语和成语,在汉语中也有很多与佛教和道教有关的表达和成语,如:“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临时抱佛脚”,“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等等。

汉民族的“民以食为天”的文化观在我们这样一个农业大国中可谓根深蒂固,在语言中有系列反映,以“米”作偏旁的汉字有68个,以“禾”作偏旁的汉字有106个,以“食”作偏旁的汉字有86个,还有很多以“豆、麦、瓜、谷、牛、鱼、羊、肉”为偏旁的汉字,有不少以“口”为偏旁表示“吃”意义的汉字。有人统计过表示“做饭”的动词有几十个,在世界语言中可能是最丰富的,如:煮、炖、煎、熬、炸、炒、烹、焖、煨、蒸、烤、薰、爆。以吃饭喝酒为内容的饮食文化,其词汇、俗语、成语,就如丰盛的中国饭菜一样,无比丰富,真可谓妙语连珠,学不胜数。

因此,百科性文化与现实、认知、语言密不可分,在讨论语言世界观时,必须考虑“文化”这个要素,这就是在语言世界观多元论中主张将“文化”作

为一个单独因素加以论述的原因。百科性的文化与现实、认知、语言构成了一个多元模式,它们四者互相依存,互相作用,这正是图中各个箭头的含义所在。同时,这也与认知语言学所强调的“语义理解须依赖百科性知识”的观点完全一致。

五、现实、认知、语言、文化诸要素多元融合

语言世界观中讨论的这四个要素,它们多元溶合,互相作用,形成一个统一体。这里所说的互相作用包括两层含义:(a)决定作用:在现实、认知、语言三个要素中,自左向右是决定和造就作用;(b)影响作用:在现实、认知、语言三个要素中,自右向左是反映和影响作用。

语言世界观中诸要素互相作用,溶为一体,实际上就形成了一个民族世界观。如在中国文革期间,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现实社会中,在所谓“红色海洋”的耳濡目染之中,形成了一个“紧跟高举”的思维定势,从而决定了语言不离“语录”,张口也有“斗争、夺权”,闭口也想“一抓就灵”,家庭语言也受到严重歪曲,饭前饭后要高呼“万寿无疆”、“永远健康”,现实、思维、语言、文化四者溶为一体,形成一个“史无前例”的时期,在这种氛围中长大的孩子,认知、语言、行动都曾明显带有“造反有理”的时代特征。

从“禁忌语”也可看出这几者多元溶合关系。“禁忌语”既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也是一种语言现象。通过对两种现象兼而有之的“禁忌语”的研究,也可看出现实、思维、语言之间的关系。首先,禁忌语反映的是社会文化现象,对某些事情须加以回避,这就决定了在人们思维中形成了一个与某种禁忌概念相联系的“禁忌语义场”(如“性”等问题)。这种思维就决定了语言中的禁忌语,在交际场合中不可随便乱用这些相关词语,思维中的“禁忌语义场”不能随随便便地用语言表述,只可放在心中“默思”,在很多场合万不可随意言传。

中国历史上几次有关“文字狱”的记载,都与使用禁忌语有联系。如清朝有位文人作诗不慎,曰:“清风不识字,何必乱翻书”,其实他是触景生情,看到一阵风吹过,将书翻了几页,为此有感而作,无意犯了禁忌,“清风”中的“清”正是当朝的名称,由此而遭杀身之祸。在文革期间,也有很多词语是人们必须回避使用的。

在谈到禁忌语时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非洲东南部的祖鲁人,妻子不能提及公公或公公的兄弟的名字,如果违反了这一禁忌语规则(或可称为禁忌语法律),她可能会被处死(Trudgill, 1982: 87)。

Lakoff & Johnson(1980, 1999)所建立的“隐喻认知理论”也能反映出这四者多元融合的现象,为语言世界观多元论提供依据。他们认为,概念隐喻源自人

们对客观世界,特别是空间和自身的关系,它是人们认识世界、建构语言的认知方式,约束人们对现实的认识和语言表达。这体现了“现实—认知—语言”从左向右的决定关系:人类在现实生活中所形成的可见的、有形的、熟悉的、具体的概念,可隐喻性地转用在其它不可见的、无形的、生疏的、抽象的概念之中。概念隐喻系统是语言中具体隐喻词句的表达基础。我们还可从“语言—认知—现实”这一方向来理解:语言中的隐喻性词语表达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人类的认知,人类的概念隐喻系统也会对人类认识客观外界产生影响力。

婴幼儿很早就感知体验的基础上建立起“达到目的就要到某一目的地”概念隐喻,可表示如下:

抽象的“目的”·可通过·具体的“目的地”来理解

要达到获得某物的目的·就要到有此物的地方
要达成目的·就要到某目的地

这一概念隐喻成为支配我们相关思维和语言表达的基础,如想“吃饭”必须要到“有饭可吃的地方”去;如想要“得到一本书”就要到“图书馆或书店”等,“吃饭”、“要书”是要实现的目标,是抽象概念,“到有饭可吃的地方”或“到图书馆”等是目的地,是具体概念,隐喻就是用具体概念来表示抽象概念,人们经过生活经验的反复实践和体验,自然就将这两者连在一起了:分管抽象“目的”的神经元和分管具体“地点”的神经元处于大脑的不同位置,经反复不断地体验和刺激,这两处的神经元之间就能建立联系,这就从神经学上为概念隐喻提供了生理基础。基于这种神经元的连接就形成了一系列的思维方式:要解决某一问题,实现某一目的,就必须想出某一途径、方法。

又如,正因为我们心智中有“爱情是旅行”这一概念隐喻性的思维方式,在我们的语言表达中才常常用可感知的旅行来说明抽象的“爱情”:牵着你的手向前走,肩并肩地前进,越过障碍,克服困难,永不分手,越走越紧,共同走进婚姻的殿堂,天荒地老不分手……

概念隐喻既是一种认知方式,又可视作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它与社会文化中最基本的价值观相一致(Lakoff & Johnson: 1980)。所以,“隐喻认知理论”也为语言世界观多元论提供了理论依据。

六、结束语

正如文首所述,哲学中语言论转向所形成的分析哲学专注于语义和语用研究,正是他们的贡献,为语言学中这两个学科的形成提供关键的理论基础。或者说,语言学与哲学密切相关的一个关键纽带就是“语义”和“语用”,因此我们可以说:语义和语用理论既是语言学的一个层面,也是语言哲学的

核心内容之一,研究语义就是要研究语言和人、世界、文化之间的多元关系,研究语言世界观,也要分析现实、认知(思维)、语言、文化之间的多元关系。

研究语言在世界观形成中所起的作用,到目前为止有以下四种观点:反映现实论、认知假说论、语言决定论、语言思维二元论,但它们各自还有不完善之处,前三种观点具有明显的单向论述的倾向,且这四种观点都没能将社会文化因素考虑进来,为此我们提出了语言世界观多元论,认为现实、认知、语言和文化这四要素之间存在着一个“多元相互作用”的关系,并认为这一观点比其它几个观点更为完整,更能说明问题,也更有解释力。

笔者近年来基于体验哲学和认知语言学的理论重点论述了语言体验性,一方面为语言世界观多元论作了理论铺垫,另一方面语言世界观多元论也为语言体验性提供了证实。

参考文献:

- [1] CONDILLAC E B. Essai sur l'origine des Connaissances Humaines [M]. 1746 洪洁求,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9.
- [2] HARMAN JOHN. The iconicity of grammar: isomorphism and motivation[J]. Language, 1980, 56.
- [3] LAKOFF G, M JOHNSON. Metaphors we live by[M].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0.
- [4] LAKOFF G, M JOHNSON. Philosophy in the flesh - the embodied mind and its challenge to western thought[M]. New York: Basic Books, 1999.
- [5] PAGET JEAN. The principles of genetic epistemology[M]. 1970. 王宪钊,等译.发生认识论原理.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 [6] ROBINSON R H. A short history of linguistics[M]. London: Longman Group Limited, 1967. 许德宝译.简明语言学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
- [7] SAPIR E 作为一门科学的语言学的地位 [M]. 1929. 马毅,等译. 1994: 129 - 136
- [8] SAUSSURE E DE. Course in General Linguistics [M]. 1916. 高名凯译.普通语言学教程.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 [9] TRUDGILL PETER. Sociolinguistics: An Introduction [M]. Harmondsworth: Penguin Books, 1982
- [10]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 [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 [11] 潘文国. 汉英语对比纲要 [M]. 北京:北京语言文化大学,1997.
- [12] 钱连冠. 语言与文化的全息关系 [M]//毕研韬,李闻海. 语言与文化研究.北京:人民中国出版社,1988
- [13] 斯大林. 斯大林选集(下卷) [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 [14] 沈家煊. 句法的象似性问题 [J]. 外语教学与研究, 1993, (1).
- [15] 涂纪亮. 当代西方著名哲学家评传——语言哲学 [M]. 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6
- [16] 王寅. “现实——认知——语言”三因素间的反映与对应滤减现象 [J]. 四川外语学院学报, 1998, (3).
- [17] 王寅. 认知语言学探索 [M]. 重庆:重庆出版社,2005.

The Pluralism of Linguistic World Outlook: The 8th Paper on Linguistic Embodiment Based on Embodied Philosophy and CL

WANG Yin

(Sichuan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031, China)

Abstract: Linguistic World Outlook is mainly concerned with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anguage, cognition, reality and social world, and language roles in the formation of world outlook. At present there are four principal viewpoints: (1) reflection theory; (2) cognition hypothesis; (3) linguistic determinism; (4) dualism of language and thought. The first three are obviously unidirectional, and all of the four viewpoints have no concern about social and cultural factors. Thus, the present paper proposes Pluralism of Linguistic World Outlook, with emphasis on the pluralist interactions between the four factors “reality, culture, cognition, language”, from which we can get the determinist relationship, i.e. reality determines cognition, which in turn determines language, and the influential relationship, i.e. language influences cognition, which in turn influences reality. We have recently stressed on the embodiment feature of language based on Embodied Philosophy and Cognitive Linguistics, on the one hand, it has laid a theoretical foundation for Pluralism of Linguistic World Outlook, on the other hand, Pluralism has also offered support for the embodiment feature of language.

Key words: pluralism of linguistic world outlook; embodied philosophy; cognitive linguistics; linguistic embodiment view